

范磊：“小邦大治”，（上）

新加坡的多元族群治理有何启示？

（东西问）范磊：“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多元族群治理有何启示？

中新社济南5月30日电 题：“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多元族群治理有何启示？

——专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范磊

中新社记者李欣新加坡的“小邦大治”为世界所瞩目，其族群治理的成功引发关注和思考。对其他同类型国家而言，新加坡的多元族群社会治理模式有何镜鉴与启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加坡国别研究专家范磊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学习新加坡并不是僵化照抄照

搬其治理模式和现成经验，而是学习治理思路。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的多元族群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范磊：新加坡可谓典型的“先天不足”，幅员有限却又种族多元，但形成了与其体量并不相称的为世界瞩目的“小邦大治”。社会的异质性、族群关系的复杂性及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序性等都是其多元族群社会治理进程的生动呈现。

1819年开埠，新加坡开启近代化进程。地处东西方交通十字路口，为其移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并最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海岛区域各色人种

的相继移入。新加坡的人口结构也随之日趋多元，现代新加坡多元族群社会的雏形逐步显现。

经过200年的互动交流，新加坡逐渐形成了被称作CMIO的族群关系结构：即华人(Chinese)、马来人(Malays)、印度人(Indian)及其他族群(Others)，平等共处的四大族裔群体构成了当前带有典型马赛克特质的“新加坡民族共同体”的多彩底色。

面对独立后国内族群关系的复杂情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定多元平等的族群政策以及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协调了族群关系，在利益、规范和认同等不同维度上弱化了各族

群和宗教社群之间曾存在的尖锐矛盾，在持续消解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张力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共融”的嵌入式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既得益于政府与族群精英的积极推动，也源于各族群在“新加坡国家”框架内同心同德的主动认同。这似乎也是其他多民族国家所普遍存在、共同经历又或是翘首以盼的善治画面。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如何消解族群与国家间的结构性张力，建构多元共融的和谐社会？

范磊：在多元族群社会中，族群与国家是一对共生却又有内在结构性张力的变量，国民身份及族群身份的双重性是对国家民族政策和制度

建设的重大考验。国家可能会以人口占多数的族群，或最强势的族群作为国家认同的对象，采取同化政策；也可能运用公共权力主导和推动，重塑能为所有族群接受的新的上位认同，形成多元共融的民族共同体。

此类政策中，如何在国家及多族群之间寻求平衡以促进稳定及发展，是对治理智慧的考验，新加坡即是如此。

独立后，新加坡通过软性的宏观政策引领推动了族群和谐的实现，并依托硬性的具体制度保障塑造了多元共融的治理模式。在宏观政策设计方面，新加坡政府从独立伊始就在语言、教育、宗教、就业、人才等多个领域确立了多元平等的族群政



新加坡街头的小汽车。
中新社发 刘万强 摄



新加坡旅游胜地圣淘沙。
中新社发 章轲 摄